

## 武田泰淳与他的处女作评传《司马迁》

冯 彤 王伟军

**提 要：**武田泰淳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中国派”知识分子。尽管他在战后成长为第一“战后派”小说家而声名鹊起，但实际上他的文学创作与学界声响早在日本的侵华战争期间便已然发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其在1943年4月发表的处女作评传《司马迁》，本文将试图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作家的中国战场体验，钩沉评传《司马迁》文本中的文学隐喻痕迹，去洞见其从军体验与司马迁式自我告白的逻辑联系，发掘出其“史记的世界”的构建模式与反战意识的生成机制和个性光泽。

**关键词：**武田泰淳；侵华战争；司马迁；史记；反战意识

### Takeda Tajun and His First Novel Sima Qian

Feng Tong Wang Weijun

**Abstract:** Takeda Tajun is one of the few "Chinese school" intellectual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Although he rose to fame after the war as the first "postwar" novelist, in fact, his literary creation and academic voice began during the Japanes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Among them, the most striking is sima Qian, his first work published in April 1943.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mbin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t that time and the author's experience on the Battlefield in China, and explore the literary metaphor traces in the text of sima Qian,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logical connection between his military experience and Sima Qian's self-confession. Excavate his "World of Historical Records" construction mode and anti-war consciousness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personality luster.

**Key words:** Takeda Tajun; Th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Sima qian; Historical records; Anti-war awareness

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期间，武田泰淳作为“中国文学研究会”核心成员之一，他与当时许许多多日本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同样没有摆脱受日本军国主义机器之牵累而被拖入战争深渊的命运。1937年10月，时年25岁的武田泰淳应召入伍，作为一名侵华日军辎重补充兵被派往了中国的华中战场。从11月初登陆上海的吴淞口开始，在侵华日军的从军生涯和第一次“中国之旅”便拉开了武田泰淳人生世界的时代序幕；其后，他跟随部队辗转于中国的上海、杭州、南京、徐州、庐州、武汉、南昌等地。

两年后的1939年10月，在侵华战争仍在持续之时，晋升为一等辎重补充兵的武田结束了他为期两年的军旅生活退伍了。也就是说，作为彼时日本的“中国派”文学青年，“中国文学研究会”核心成员、中国近代文学的“发烧友”，他的第一次“中国之旅”结束了。但是，他的内心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片刻的安宁。一个曾满怀中国志趣、热爱中国文学的“少壮派”知识分子，一个被日本军国主义所累卷入战争洪流的日军士兵，用他自己的笔记录着战争与中国，思考着历史与现实，从此走上了属于自己的文学之路。

在我们试图追索第一“战后派”小说家武田泰淳文学轨迹的时候，便不难发现，他的文学发端离不开自己的中国体验和侵华战争从军经历这两个现实命题，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彼时武田的文学创作尚与战争题材小说相距遥远。因为，从其1939年从军期间开始研读和思考《史记》到1943年4月其处女作评传《司马迁》付梓印刷时已过去了近四年的时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田泰淳这一处女作评传与其在中国战场上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之间，想必存在剪不断

理还乱的思想葛藤。

## 一、评传《司马迁》的缘起

1939年秋，武田泰淳离开中国战场回到自己的故乡日本东京。从1940年初开始他便在《中国文学月报》和《中国文学》（《中国文学月报》从1939年4月第60号起更名为《中国文学》）上连续发表多篇报告文学性质的文章。其中包括《与支那文化相关的一封信》、《杭州春天的故事》、《我在支那的思考》，这些文章与他战后初期发表的小说《庐州风景》在立意上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具体地说，就是更多地描摹出中国被无端侵害，中国人被无端杀戮，城市乡村被践踏破坏的真实情状，他的笔触常常流露出中国精神不可辱没和中华民族不容小觑的文学隐喻。尽管彼时的武田泰淳还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为反对战争、呼唤和平去振臂高呼或摇旗呐喊的力量，但是可以说他的文学立场是明确的、执着的、正义的。

成长在东京长泉院的净土宗和尚，曾活跃于“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核心成员，武田的人生、文学和思想，历经侵华战争之洗礼，如凤凰涅槃一般浴火重生，他完全蜕变了。在武田这一重大人生转折时期，他的知己竹内好感受颇深，对武田从军归国的变化十分惊诧，亦颇感欣慰。竹内曾这样描述1939年秋与武田重逢时的真实感受。

1939年秋，从前既不抽烟也不喝酒的武田泰淳回来了。在战争中做了从军两年的后勤补充兵，他变化非常大，给我的感觉简直就是一个人的脱胎换骨。<sup>[1]</sup>

他变化非常大，可以说是一改旧

貌，与其说是归来之后，倒不如说是在从军期间，他写的文章、寄给我的信，就已经与从前大不相同了。《寄给北京诸位的诗》，就是他所写文章中呈现出异色的实例……也就是说，他不再是一位天真的和尚，而是成长为一个标准的男子汉了。<sup>[2]</sup>

从军归来的武田泰淳，他的人、文学、思想变化了，这不是简单地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顺其自然出现的变化；是一个经受战争洗礼、生死考验，深受肉体与精神双重磨练的，人格与性情的大转换。

武田本人亦曾在其1942年12月写就的《司马迁》自序中说道：

我开始思考《史记》，是在1939年出征以后。在残酷的战地生活里，这部历经千年、流传至今，古典巨作的强悍，震颤着我的灵魂。我感觉到，汉代的世界，就同当今的现实世界一模一样。在思考历史残酷、世界冷峻，或者现实残酷性的时候，我才发现，《史记》的思想就是最可靠的现实依凭。每当偶有闲暇、耽读《史记》，司马迁世界构想的深邃与悠远，越来越让我不由自主地惊叹不已……我从没想过，要把《史记》作为个别考证对象，或放在古代史研究文本的位置上去开展研究。我的想法是，把《史记》中的世界置于眼前，在它喧嚣激荡的空间里，去验证我的精神世界……在去年（1941年）十二月八日以前，我还一直为这个写作任务低迷徘徊……从那天开始，我心里变得豁然开朗，才能最终把《司马迁》创作出来。<sup>[3]</sup>

就中可知，武田泰淳在1939年秋出征以后的中国战场上就已经开始研读《史记》了。那么，想来他把自己的命运与司马迁联

系在一起，把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历史世界与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是经过漫长的时间积累和思考铺垫的。他并不是把《史记》作为评传文学进行学术性的个案性分析，也没有为其设定史学研究的基调。“我的想法是，把《史记》中的世界置于眼前，在它喧嚣激荡的空间里，去验证我的精神世界”，这一段告白的意味已经十分明显，并且这一想法与后来竹内好对评传《司马迁》的界定是一致的。我们可以认为，武田泰淳历经数年创作完成的评传《司马迁》，是一部托物言志、针砭时弊的倾心力作。“我感觉到，汉代的世界，就同现实世界一模一样。在思考历史残酷、世界冷峻，或者现实残酷性的时候，我发现，《史记》的思想就是最可靠的依凭”这里所说的“最可靠的依凭”是什么，正是武田泰淳要迫切告白，去警示和呼吁日本人，特别是那些偏离理性正义轨道的日本知识分子的东西。武田泰淳凭借《史记》中，司马迁对无数历史人物的褒贬评价，展现出一幅博大精深、汪洋恣肆的历史空间画卷，勾勒出一个政治的“人”推动历史、“世界中心”不断转换，二元或多元持续的历史世界；他不仅隐晦地批判了一元永续、万世一系的错误和荒谬，还以秦始皇、吕雉的历史实例，昭示出“皇权”代理人作为普通人的一般性，驳斥了历史绝对因果关系信奉者的愚昧。从武田泰淳《司马迁》的自序中便可看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试图在抨击日本军国主义当权者，呼吁日本人去反思自己的夜郎自大，反思侵略战争的错误取向，他的理性判断几乎预见到了大和民族战争选择必将走向万劫不复深渊的命运。

武田泰淳与评传《司马迁》的因缘际会，与他从军期间发表的《寄给北京诸位的诗》并非毫无关联。关于当时的相关细

节和武田泰淳的真实心境，在其1964年撰写的回忆性随笔“《司马迁》”一文中叙述得比较详尽。

我每周有三天通勤去日本出版文化协会，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待在父亲做住持的寺院的二楼里读书。

日本评论社的赤木健介（当时，赤木是刚刚被保释出狱的思想犯，不久之后还要回到监狱继续服刑。）来拜访我。他是读了我在从军期间撰写的，邮寄回日本后，刊载于《中国文学月报》的《寄给北京诸位的诗》才来拜访我的。他希望我作为作者，参与东洋思想丛书的写作。当他把计划出版的东洋思想丛书目录拿给我的时候，只剩下杜甫和司马迁的写作者还没有定下来。

我犹豫了好久，到底是选择杜甫，还是司马迁。因为研究诗人杜甫的专家很多，而有关汉代史学家的研究不是热门，所以最后我决定去写司马迁。<sup>[4]</sup>

出生和成长于佛教寺院家庭的武田和尚，他的中国志趣、中国憧憬、中国热情，主要缘起于佛经典籍、日本汉学，特别是唐诗宋词的华彩世界，而其有志于“诗圣”杜甫之研究也就无需赘言了。实际上，从“中国文学研究会”创立伊始，武田即曾涉足过诗人杜甫的相关研究。但相比之下，史学家司马迁其人的特殊遭遇，以及他在《史记》中展现的汪洋恣肆的历史画卷，更加能够激发起武田泰淳的现实心境与思想共鸣。因此，在从军期间就着手研习《史记》并记录心得体会的武田，选择司马迁去比照和慰藉自己的现实人生况味，选择《史记》去梳理和洞见现实世界应在情理之中。三十年代初曾积极参与无产阶级反帝反战运动，数次被捕入狱，历经波折屈辱的武田和尚，想必唯

有秉持“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情怀，才有可能释怀长久以来郁结于心的屈辱和愤懑情绪。正如竹内好所评价的那样，“武田的《司马迁》，只不过是假托论述《史记》作品结构的外在形式而已。从实际的构思方法上来看，可以说就是作者一种彻头彻尾的自我告白。”<sup>[5]</sup>

## 二、战争体验与《史记》中的“人”与“空间”

在1940年初发表在《中国文学月报》上的《关于支那文化的信》中，武田曾写道：“我最先目睹的是布满弹痕、残垣断壁的支那的房屋，还有腐烂后一言不发的支那人的尸体。学校里倒着的课桌上还有布满泥尘的教科书，图书馆里成套的《新青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杂志已被雨水打湿。此情此景让我仿佛看到了文化的寂寥和毁灭的无常。”<sup>[6]</sup>战争的残酷，无情地嘲弄了武田的人文精神和日常的生活感受。“像小孩儿一样的中国士兵，稀里糊涂地成为俘虏，被当场砍下了脑袋。而大部队似乎对这种小事根本不屑一顾，悄无声息地从旁边走过”<sup>[7]</sup>的情景，使武田切实感受到了日本军人对生命的蔑视，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冲击和震撼。

“那时，我是反对战争的<sup>[8]</sup>……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可耻、痛苦和令人厌恶的。<sup>[9]</sup>”竹内好也认为：“那一时段的体验和在中国的思考，可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日后的人生。”<sup>[10]</sup>两年的兵营生活，让他变了一个人。就这一点而言，传记文学《司马迁》的创作，应该是武田对侵华战争感到可耻、痛苦、厌倦和反感的产物。武田反战思绪所形成的最初形态，不是去揭露战争的本质而是远离这种剪不断、理

还乱的烦恼，这或许便是武田其人反战立场的实态。

书写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于当时的武田而言，显然有逃避现实之嫌。同时不应忽略的是，在这样的描写中隐含着对现实的影射，抒发着对生存环境的情绪，同样是文人们惯用的手段。川端康成在文学报国的甚嚣尘上的民族气氛里去写汤泽温泉的一个艺伎，谷崎润一郎在百万关东军为日本浴血奋战的时代逆流中潜心打造一个女性形象，实际上都是有意为之的产物。武田泰淳在中国人留下的故纸堆中流连忘返，无不是面对现实生活空间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当时完全没有言论自由。至少在太平洋战争阶段，用任何手段公然表明反对战争和法西斯政权，原本就是不可能的，甚至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sup>[11]</sup>《司马迁》所显示的对人类、历史、世界的认知模式，不仅是贯穿于武田文学世界的最重要因素，同时也反映出作家作为文人所具有的非凡才华。

在《司马迁》中有这样一段叙述：“世界历史是政治的历史。唯有政治塑造世界。肩挑政治的人也肩挑世界。《史记》意味的政治就是‘推动之力’……只有被作为政治性的人，才会在历史的舞台上获得一个角色。……这个人物与那个人物发生关系，这个角色与那个角色产生联系，由此才会构成《史记》的整体。……推动世界的除了人别无他者。”<sup>[12]</sup>在武田泰淳的《司马迁》中，“人”是一个关键词。必须要把“人”置身于“世界”、“历史”、“文化”的关系之中才能体现其主体化的相对性的存在。《土民的表情》中的感慨是不可以简单地用“人道主义理论”加以解释的，更重要的是武田认识到，“人”在“世界”这一空间里面对

意识形态既是微弱无力的存在，也是唯一抗拒的存在。

在武田所构筑的历史空间里，面对国家权力不仅“人”是脆弱的存在，甚至经过漫长历史积淀而凝聚成的“文化”也决非是一成不变牢不可破的实体。武田对转眼间就会灰飞烟灭的“文化”也同样发出了无限的感慨。“二十四史是什么？北京图书馆是什么？万卷成灰，销声匿迹，只留下了傻乎乎的自己。”<sup>[13]</sup>

武田泰淳在此要表达的是：终究会消失的人、可以毁灭的文化器物，都不是文化和历史本身。文化和历史仅仅是人类意志的表象而已。“灭亡”支配一切的“空间”，不仅是人类，甚至任何文化和历史等时间性的存在都无法逃避这样的命运。在谈及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动机和意义时，武田在其评传《司马迁》第二部分“史记的世界”中有着这样的表述：“汉”就是世界本身。司马迁便是在这个时候写作史记的。而司马迁的旁边站着的是“世界”的统一者—汉武帝。在笼罩着汉武帝巨大身影的汉帝国的一隅，司马迁写就了一部历史。这个历史是关于“世界”的历史，撰写他即意味着要思考“整体”。<sup>[14]</sup>

由是观之，特殊的人生履历和战场体验对武田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多重的、立体式的冲击，促使其对司马迁产生了自然的憧憬和亲近感。所以，在评传《司马迁》中提出了：考虑“世界整体的历史”以及日本在世界中的定位是当前日本的思想任务。武田在《司马迁》中明确阐明了《本纪》并不是孤立的存在，所谓的“世界中心”是不断转换的。《史记》中“本纪”“书”“表”“列传”的有机结合、相互支撑共同建构了一个庞大的相互作用的历史空间。这一时期，天皇在日本是绝



对的权威，被视为“现人神”。日本的国内舆论样态已经表露出意欲成为“东亚共荣圈”的中心，充当“东亚共荣圈”领袖的意图。甚至宣传“皇道精神”、“八纮一宇”的侵略口号已经开始常态化，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观开始逐步躁动和风靡起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武田泰淳通过《司马迁》来阐释多元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无疑是极具挑战性和危险性的。透过武田的评传《司马迁》，我们可以看到，武田泰淳充分认定“人”的政治属性，否定帝王的神格，能够从历史人物的“持续”与“非持续”性以及历史的空间构造这两方面来正确地看待“整体世界”。武田泰淳强调对人的重视以及人在历史中的象征意义和文化承载功能，完全是对忽视个人存在的“玉碎”的圣战精神的挑战，是对战时日本“万世一系”的皇国史观和日本中心论的否定。武田泰淳同时借助对《史记》中不同政治立场文人的褒贬评价，构建起了心目中理想文人的形象。

在论述《史记》中司马迁对“匈奴问题”认识的时候写道：“匈奴的历史久远，生活传统古老，他们的生活与汉人完全不同……他们的文化与汉人相差悬殊，难道就可以说匈奴是拙劣、落后的吗？即便他们变换着的生活方式有所不同，就可以说他们不对吗……强忍悲切，司马迁强忍悲切，凝视着匈奴的问题。”<sup>[15]</sup>这简短的论述，不仅满含司马迁的历史观感，也满含着武田泰淳的文化判断。对于民族文化差异的问题与看法，武田泰淳眼光的独到，与其从军体验、中国观察密切相关。引文中的“匈奴”与“汉”映照着现实世界中的中国、日本，哪一个是彼时被蔑视甚至无视的“中国”，哪一个又是自感优越盛气凌人的“日本”呢？很显然，武田

在此处看似无缘无故的思维性跳跃，并不是毫无道理的。

在武田的评传《司马迁》中，他着重评述了秦始皇和吕雉这两个所谓的“世界的中心”式的历史人物。秦始皇功高盖世，虽然忌讳周围的人提到“死”这个字，但仍然避免不了他作为一个平凡人生命终点的来临，最后不过是落得客死出巡途中的下场，留下随行臣子无奈之下以咸鱼遮蔽腐臭尸骸的不堪结局。

汉高主刘邦的皇后吕雉心狠手辣，在高祖死后，她开始残杀异己、戕害刘家子嗣，扶植外戚把持汉朝大政。她的极端妒忌和报复心理甚至做出斩断戚夫人的手脚、挖去双眼、残害使其耳聋、逼其喝下哑药，将她扔在厕所里，称其为“人彘”，还特意把自己的儿子孝惠皇帝叫过来看。吕后不愧为“本纪”里女性的“世界的中心”之一。然而，在她去世以后，吕家被扶植起来的一众权臣，迅速遭到刘氏皇族的清剿屠戮。

武田泰淳在《司马迁》中，把孝惠帝看过“人彘”之后所说的“此非人之所为也”的话，刻意加以强调，并辅以评价说：“但是，这是事实，事实确实如此”。<sup>[16]</sup>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武田泰淳在文学表述上的刻意强调是另有深意的。

### 三、耻辱感的慰藉

武田泰淳曾在其评传《司马迁》的第一部分“司马迁传”的开头处写道：

司马迁是一个忍辱负重、“苟且偷生”的人。作为士人阶层的一员，一般人很难活下去的情形之下，这个男人残喘地苟活了下来……腐刑也就是官

刑，听起来就让人感到悲惨不已。司马迁遭受这种甚至会改变人之性格的刑罚之后，日夜煎熬、咬紧牙关活了下来……为了消除耻辱，他发愤著书、开始去撰写《史记》……

许多名著皆缘于痛苦而问世，那些痛苦的情形，没有一个比司马迁更清清楚楚、更痛彻心扉的……他的心境，并非一般的情绪和简单的伤感；换成现代语言，或许就是思想吧。总而言之，司马迁持有绝对视死如归的心境，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种心境，在《报任少卿书》中已经呈现得淋漓尽致了。<sup>[17]</sup>

就中可知，武田泰淳在战争期间选择评传司马迁和《史记》去自我告白，并不仅仅是一个机缘巧合那么简单，而是其有意为之的产物。我们可以认为，正如武田所言，“我犹豫了很久，到底是选择杜甫，还是选择司马迁这个问题。因为研究诗人杜甫的专家很多，而有关汉代史学家的研究并不是热门，所以最后我决定去写司马迁”。<sup>[18]</sup>这种考虑，的确是激励武田泰淳撰写评传《司马迁》的动机之一。但是，当我们结合武田泰淳的生活轨迹和人生遭遇，再去深刻分析、体会他在“司马迁传”中的内容时便可发现，“太史公”司马迁的生平遭际与武田泰淳之间存在着某种可以隔空对话那样的联系。司马迁遭受宫刑的痛苦、耻辱与愤懑，决不像诗人杜甫那么简单。尽管，唐代诗人杜甫空有旷世之才，却无奈适逢“安史之乱”、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他时运不济、不得不辗转流离面对自己不幸的人生。但是，杜甫也曾有过类似在成都草堂安然自得的生活。他的痛苦与遭际，在程度上还完全不能与司马迁同日而语，或者说他的痛苦、

悲悯、甚至在时空跨越、人间视域上都远远未及司马迁的思想境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武田泰淳在从军期间阅读司马迁《史记》的时候，便在内心与司马迁这位史学巨擘之间，产生了强烈的隔空共鸣，他采用了托物于历史、言志于当世的手法，用司马迁照见真实的自己，用《史记》照见现实的世界。

在写作评传《司马迁》以前，武田泰淳的人生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风平浪静，这已经是被其青春遭遇印证了的事实。他到底凭借什么与司马迁之间产生了共鸣，那就是帝国主义日本“赐予”武田和尚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不可名状的痛苦和耻辱。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1. 出生在佛教寺院家庭的武田泰淳，反感保持娶妻生子陋习的佛教寺院家庭生活，反感寺院接受“布施”的不劳而获行为；不情愿做和尚，又无法抗拒本来不应该属于自己的家传衣钵；无奈地做了和尚，便立誓不想结婚的他，厌倦无趣的、晨钟暮鼓的生活；普通民众鄙视的和尚的目光和武田和尚自身的精神洁癖完全禁锢了他的青春生活。

2. 崇尚马克思主义思想，热衷于左翼反帝反战运动，却遭到当局镇压而数次被逮捕拘留，自己无端地成为备受非议的“红色和尚”，最终自己不得不选择“转向”。

3. 热爱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学，中国却沦为被日本觊觎和侵略的国家，热衷于交往在日的中国学生，却因此受到无辜的牵连而被捕入狱，似乎他的青春选择都冥冥中被打上了“违法”和“罪恶”的烙印。

4. 作为核心成员之一，加入“中国文学研究会”，不仅在学术研究上步履维艰，甚至为人品格上也遭到同人的非议，最终武田泰淳被卷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

战争的洪流。

5.历史的荒谬、日本的邪恶，无形中把武田泰淳驱赶到了侵华战场，他拿起枪，走向了自己曾深爱的、朋友的家园。这也是武田泰淳蒙受的一切青春遭遇中，最为有口难辩、有苦难诉的屈辱，也正是这个和尚士兵、中国加害者的屈辱和身份认同，使武田与司马迁之间彻底地、浑然地联系在了一起。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从武田的人生体验出发，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sup>[19]</sup>，或者“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sup>[20]</sup>这类箴言警句，不可能不触动战争期间武田泰淳精神世界的心弦。换言之，评传《司马迁》是武田泰淳与时隔千年的司马迁之间发生精神共鸣的产物，这一产物并不仅仅关乎作者本身，更重要的是关乎整个世界，而这一评传本身也就显然更加注重战争反思和控诉日本人错误的“皇国史观”。

## 结语

以评传《司马迁》为依托，武田泰淳想要强调的是：“圣战”、“玉碎”这样日本法西斯主义性质的疯狂口号，是完全泯灭人性、无视人的存在逻辑的；侵略战争的破坏与杀戮，是彻彻底底的非人道行径，日本人夜郎自大，高举大和民族优越

感的荒唐旗帜，在近乎于癫狂病态中制造出了一幕幕人间的悲剧和受害者的惨剧。再者，司马迁《史记》的空间世界已然警示出所谓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血统”，“八纮一宇”的“蓝图”，完全是自欺欺人、荒谬不堪的东西；这种荒谬的逻辑既不会被历史所接受，也不会被现实所接受。我们可以说，在那个稍有不慎，即有可能身陷囹圄、甚至殃及无辜的言论统治时代，武田泰淳亦是如履薄冰在严酷的政治空气中告白了自己的愤懑，用思想与文字勇敢地抗拒着天皇制军国主义。

在军国主义风靡日本的时代，武田泰淳以评传文学为依托的隐秘告白，显示出他不失大节、执着独立精神、坚守批判意识文人的崇高品味。武田泰淳真正成长为一个文学家，一个日本近代文坛的“战后派”小说家是在1946年从上海被遣返回国之后。如果说，任何时代、任何地点反对战争、呼吁和平的文学形式，皆可框定在“反战文学”的范畴里。那么，武田泰淳显然是在有限的框架内尽其所能、切实反战的先驱式人物。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今时代，文明人类对日本人战争反省的要求，除了战争批判以外，还应该拥有更为客观、更为宽容的期待。武田的反战思想，不仅应该得到中国人的认可，更应该成为日本人反省战争的启示录。知识分子向来就是一个特殊的、复杂的社会阶层，日本的也好中国的也罢，多一点诚意少一点欺骗、多一点理性少一点偏见，尤其应该成为时代学人秉持之操守。

### 注释：

[1] 竹内好，小野忍，堀田善衛等：「武田泰淳(上)」，『近代文学』第15卷,1960年第7期，第29頁。



- [2] 同注[1],第30-31頁。
- [3] 武田泰淳:『武田泰淳全集』第11卷,東京:筑摩書房,1972年,第4頁。
- [4] 武田泰淳:「司馬遷」,『黄河海に入りて流れる』,東京:勁草書房,1971年,第368頁。
- [5] 竹内好:「司馬遷の解説」,埴谷雄高編:『増補武田泰淳研究』,東京:筑摩書房,1980年,第324頁。
- [6] 武田泰淳:「支那文化に関する手紙」,『揚子江のほとり』,東京:芳賀書店,1971年,第101頁。
- [7] 武田泰淳:「ソンをしなかつた輜重兵」,『揚子江のほとり』,東京:芳賀書店,1971年,第57頁。
- [8] 武田泰淳,堀田善衛:『私はもう中国を語らない』,東京:朝日新聞社,1973年,第28頁。
- [9] 同注[8],第38頁。
- [10] 竹内好:『司馬遷一史記の世界』解説,東京:講談社,1972年,第230頁。
- [11] 加藤周一:《日本文化雑種性》,杨铁婴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8頁。
- [12] 武田泰淳:『司馬遷一史記の世界』,東京:講談社,1997年,第65-66頁。
- [13] 同注[6],第103頁。
- [14] 同注[12],第63-64頁。
- [15] 同注[3],第11-112頁。
- [16] 同注[3],第47頁。
- [17] 同注[3],第5-6頁。
- [18] 同注[4],第368頁。
- [19] 吴楚材,吴调侯选注:《古文观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10頁。
- [20] 同注[19],第206頁。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